



罗马皇帝奥古斯都

□ 陈 良

信息时代，一般人都会用电脑或手机上网。网络世界很精彩，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乐趣。比如微信就有很多功能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不少人在微信上发红包抢红包。说起发红包，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古罗马皇帝。罗马帝国有个惯例，每逢新罗马皇帝登基或发生值得举国欢庆的事件，皇帝都会向首都的平民和驻守行省的军团士兵发放红包。这个红包，并不是我

们通常所说的那种红包，而是类似于红包的赏金。早在共和时代，罗马军政要人都乐于向公众发红包，以争取更多的选票。进入帝制时代，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也推崇这种做法，此后历任皇帝纷纷仿效，久而久之就形成惯例，包括著名的“五贤帝”。

德国学者卡尔·W·韦伯对此做过统计（截止到君士坦丁），除了几个在位时间极短的皇帝，其他罗马皇帝都发放过红包。当时的银币单位是第纳尔，奥古斯都发过7次，总额13995万；提必略发过4次，总额5200万。五贤帝中，安东尼·庇护发过9次，总额16000万；马可·奥勒留发过7次，总额25000万。戴克里先、君士

坦丁所发的红包总额分别为31000万和30000万。考虑到后来的通货膨胀，发红包最大方的应是奥古斯都和马可·奥勒留。

在微信群里，如果你抢到10元以上的红包，你会觉得自己手气好，毕竟大多数红包仅有几元几毛。1罗马第纳尔银币，不知到底相当于多少人民币，但可以肯定，罗马皇帝所发的红包绝对不小。因为每次每人得到的赏金相当于军团士兵年薪的三分之一左右，金额达到这个数目，无疑会拉动社会消费，把幸福指数提高。

红包，发那么多那么大，莫非罗马皇帝“钱多人傻”？非也。那些皇帝之所以慷慨大方，其实是基于政治考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笼络人心，用古代汉语讲，就是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

舟”，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。

不过，对于罗马皇帝来说，他们虽不能说出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之类的至理名言，却对此有更直观更深切的感受。尽管奥古斯都让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，以元首（皇帝）取代执政官作为最高长官，以终身制取代任期制，但在罗马人民心中国家依然是共和国。所谓皇帝，只是罗马第一公民，而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，只有得到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认可，做皇帝才有合法性和权威性。因此，任何人当皇帝都不能忽视元老院和罗马公民。进入元老院的议员都是家财万贯的贵族，他们根本“不差钱”；而首都平民和军团士兵都是“比较差钱”的罗马公民，所以有必要向他们发红包以笼

络人心。可以想见，每次发放红包之后，随之提升的不仅是人们的幸福指数，还有对皇帝的呼声。在古罗马，皇帝是否受拥戴，通常以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时民众所爆发的欢呼声来断定，呼声越高就意味着越受拥戴与尊敬。

无论于领取者，还是发放者，红包是个好东西。尽管如此，也有加尔巴、奥托、维特里乌斯和提图斯皇帝不曾发过红包。这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非常短，前三位在位总共一年半，最后一位也不过两年。他们到底是在位时间短而没有发红包，还是因为没发红包而在位时间短，都不能妄下结论。不过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们不发必有其不发的理由。加尔巴就曾说过，士兵不应是金钱买来的，而应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参军。所以，他打破原有惯例，不向军团士兵和首都平民发红包。不发，也就罢了，可他竟然要求收回前任皇帝尼禄发过的红包。

尼禄虽是有名的暴君，但在发红包上并不吝啬。他热衷于发放赏金和物品，却并不讨好有钱有势的人，而更乐于向处于社会下层的歌手、演

员、角斗士发红包。试想，当初从尼禄那里得到红包，他们不会不高兴；而今加尔巴要收回红包，他们肯定不高兴。他这么做，自然得罪不少首都平民。加尔巴只做了半年皇帝，就被谋杀身亡。他的失败无疑是多种原因所致，对于红包的失策也算原因之一。

当然，皇帝以红包笼络人心并非上策。中国古话说得好，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。作为皇帝，向民众发放红包，只是小恩小惠而已。较之不时发红包，好的政策或法案更重要。在罗马历史上，有不少政治家推出好政策或法案，使罗马摆脱危机或走出困境。比如，公元前123年护民官盖乌斯·格拉古提出以低价或免费方式向贫民配给小麦的法案，从共和时代一直沿用到帝国时代，使得罗马从未出现因饥荒而饿死人的现象。然而，好的体制比好的政策更靠谱，因为它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
世界史林

中华春秋

震撼蒋介石心灵的警世危言

□ 常家树

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，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，不摆架子，不唱高调，竟然骑着毛驴进延安，与前几任做派完全不同，中共方面自然刮目相看。

在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，徐复观更有机会亲身把脉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政治现状，他将中共的思想、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他在延安看到的真实情况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一一作对比，便发现共产党主政的边区与国统区的差别之大令人咋舌：

共产党号召减租减息，国民党强迫征粮征税；共产党实施平均地权，国民党任其土豪兼并；共产党启发人民自觉参军抗日，国民党依靠保长抓丁拉夫。在他看来，现在的国民党就是“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”的秋后“醉醒”，虽然“铁甲长戈”却完全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之中。但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坚决反共、又有心“补天”的清醒者，对于已陷入政治危机中还不能自省的国民党，他不能不管，在表现出深深忧虑的同时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

两党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？他发现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，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。徐复观认为，中共之秘诀，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，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，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，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，发展军队，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。而国民党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，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，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，而浮出社会之上。关于执政党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，徐复观认为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是一个“半吊子”组织：横向不能到边，纵向不能到底，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。所以，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，“以一元化对一元化”。他关注到这种“党、政、军、民之领导权，一元化于党；而其工作之目标，则一元化于军”，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。

所以徐复观的结论是，抗战以来，敌后国共两党斗争之现象，“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，其次则为政之失败，最后则为军之失败”，而中共恰恰与国民党的发展过程相反，他们是步步取得胜利。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，徐复观断言，抗战胜利后，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。

（原载2016年第9期《党史纵横》）



1943年5月，徐复观受党派进驻观察延安

善纳逆耳之言

——魏文侯用人史话（二）

□ 陈家兴

所谓雄主，也并非不犯错，而是知错能改；并非不任性，而是能虚心纳谏、反躬自省。庸主则基本相反，刚愎自用，死不悔改。魏文侯有不少犯错犯浑的时候，但他的长处就在于迅速修正过失。

魏文侯攻取了中山国，尽占其封地，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。魏文侯得意地问群臣，自己是什么样的君主，众皆赞其仁德，只有任座没有阿谀并说：你得得中山国，不用来封你的弟弟，却封给自己的儿子，这算什么仁德君主。这位任座的忠言简直太过刺耳，完全是不给人一点颜面。魏文侯虽有贤名，却非神人，当然也是勃然大怒，和常人并无二致。任座见势不对，起身就溜了，这知趣而退的反应，当然也和常人一样。

魏文侯之怒，虽为人之常情，却不应成为雄主常态。魏文侯当时正好问翟璜，翟璜也说他是仁德君主，文侯问何以见得？翟璜说：“臣闻君仁则臣直。向者任座之言直，臣是以知之。”这可以看成是巧妙地给文侯戴了一顶高帽，事实上是给魏文侯一个台阶下。雄主与庸主的区别就在于，雄

主能就坡下驴、更悟其所失，庸才顶多只会余怒渐渐消而已。

魏文侯的确立马就转变颜色，有所领悟，派翟璜立即去追任座回来，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，奉为上宾。设若没这后续一幕，只怕堂下再无人敢直言，群皆阿谀唯诺而已。

还有一天，文侯与国师田子方一起饮酒，文侯忽然侧耳说，编钟的乐声有些不协调，好像左边高。田子方闻言微微一笑。这一笑就被文侯捕捉到了，便诧异地问你笑什么？估计庸人没有这么敏感，还可能把这一笑当



选人用人史话

从两枚徽章看日本军国主义

□ 李 乔

老徽章是一种史料，是一种金属质的历史档案，有道是“一枚徽章一段史”，确是如此。下面介绍两枚日本徽章，都与日本侵华史有关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实物资料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本质，认清当今日本右翼分子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思想根源。

刻在徽章上的“侵华大演习”

这枚徽章所纪念的事件，是1932年在日本本土进行的一次陆军特别大演习。

徽章正面，上部是“陆军特别大演习”七个字，中部是几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军旗和飞机背景下做演习动作，下部标出的大阪、大阪湾、神户和奈良，应是与演习有关的地方。徽章背面，上部是“参加纪念”四个字，中间大书“国辉”二字——意谓这次演习是大日本帝国的荣耀，放射着皇国国威与皇军军威的光辉。文字之间点缀着几株绽开的樱花。日本谚云“花数樱花，人数武士”，樱花成为歌颂武士道精神的一个符号。“国辉”两侧是参演部队的名称，南军有第四、第五师团，北军有第十六、第三师团。整个徽章画面充满了日本法西斯好战黷武的军国主义气息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章上所标明的时间，即这次演习发生在昭和七年，

亦即1932年。这一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年，也就是说，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，日本军部就组织了这次演习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扩大战争。演习冠以“特别”二字，透露出这次演习的不同寻常。这一年，上海事变（淞沪抗战）发生，伪满洲国成立，更可见这次演习是日本侵华的一个重要步骤。这枚徽章是对这次演习的纪念，当然也就成了日本侵华史的一个罪证。

参加这次演习的四个日本师团，都是明治年间编成的老牌师团，且都是甲种师团，后来都被派到中国战场，都对中国犯下了战争罪。比较而言，以第三、第五、第十六师团的罪行最大，其中又以第十六师团尤大。

第三师团在名古屋编成，官兵多为此地人，故又称“名古屋师团”，是唯一一支从开战到投降一直位于中国境内的师团。曾驻扎满洲，进攻吴淞口，围攻南京并参加大屠杀，参加过徐州会战、武汉会战。

第五师团在广岛编成，士兵多来自广岛等地，故又称“广岛师团”。这个师团战斗力极强，有“钢军”之称，曾创下在中国战场和70余个师先后对阵的记录，参加过察哈尔作战、南口战役、忻口战役、台儿庄战役、平型关战役，攻陷过广东等地。因第19任师团长是中国人熟知的板垣征四郎，故该师团又被称为“板垣师团”。在山西平型关，其一支千余人的部队被八路军115师消灭。

第十六师团在京都编成，官兵主

要来自京都等地，故又称“京都师团”。曾驻扎满洲，攻占上海和南京。进攻南京时攻下中山门，进城后大肆屠杀中国军民，“百人斩”就是该师团的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犯下的罪行。

第四师团编成地为大阪市，故又称“大阪师团”，因官兵主要由大阪市商販组成，故又称为“商販师团”。这个师团很特别，虽是甲种师团，但战斗力较差，有“弱旅”之称，甚至被讥为“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”。该师团曾被调往中国东北，划归关东军序列，但与中国军队交手主要是在徐州和长沙会战中，都打了败仗。二战末期，该师团与其他顽强抵抗的部队不同，投降迅速，美军对该师团的评价是“爱好和平”。据说美军占领日本后，第四师团的官兵很快就跑到美军兵营前兜售起纪念品来了。有人分析，该师团的特点与他们的商人出身很有关系。大阪历来商业发达，什么都爱讨价还价，不划算的事儿不爱干。虽然也讲为天皇效力，但总是打折扣。

罪恶的“肉弹三勇士”

这是一枚纪念所谓“肉弹三勇士”的纪念章，是日寇侵华纪念章中比较重要的一枚。所纪念的事件发生在上海事变（淞沪抗战）中。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，我十九路军死守上海江湾庙行镇，日军攻击受阻，无奈只好采用人抬爆破筒的方式突破防御工

事，有三名士兵在进攻时人弹俱爆，遂被称为“肉弹三勇士”，并被封为“护国神”，至今在日本靖国神社里还立有“肉弹三勇士”雕像。“肉弹”一词，为日俄战争期间一个日军中尉首创，指以肉身作为武器攻击敌人的军人。这枚纪念章为盾形，章面的图案是“肉弹三勇士”执弹匍匐前行状。章的背文是：庙行镇，护国之神，7222，江下、北川、作江。“7222”，指该事件发生在昭和七年（1932年）二月二十二日。江下等三人即所谓“三勇士”，他们都是进攻部队中工兵大队的一等兵。这枚徽章造得很精致，反映了日军当局对此三人的极力推崇，目的是想树起一个经典的武士道样板，以提高士兵们勇于献身的精神。

这种以“肉弹”攻击敌军的方式，最后发展成驾机攻击盟军的“神风特攻队”，虽有一定效果，但终究不能挽回其败亡的命运。

这枚纪念章，在日寇方面来说，是表彰；在我们看来，就是罪证。同时，它也是出自敌方之手的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物证。

看着这两枚日本徽章，仿佛中日战争的历史风云又翻滚在我们眼前。这些徽章留住了历史，并发出无言的警示，提醒着我们不忘血史，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。

有所思